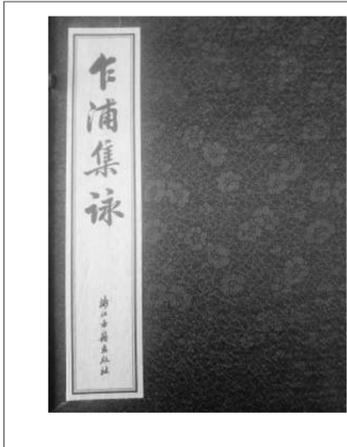


DONGHU·RENWEN

《乍浦集咏》的历史文化价值

■ 陈正其



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的四册(16卷)《乍浦集咏》

《乍浦集咏》是乍浦清代文人沈筠(沈浪仙,1802—1862)收集了乍浦当地和外地的565名作者的数千首诗歌辑录的诗集,他给后人留下了中华大地饱受战乱流离的那一段悲壮历史和歌咏故乡山川江河、春花秋月的瑰丽诗篇。

但《乍浦集咏》在平湖乍浦一度失传150多年,人们只闻《乍浦集咏》其名,未见其文。现在珍藏在平湖市图书馆的《乍浦集咏》是一套复印件,这是1991年日本著名学者大庭脩访问中国来到嘉兴时,带来当年东传的《乍浦集咏》复印件,后赠送给了平湖市政府。

《乍浦集咏》是沈筠带领一个规模宏大、分工明确的编纂队伍编纂的一部诗歌集。这在序言和事例后的乍浦集咏原事姓氏里都有记录,编纂队伍分别是“参阅”27人、“襄采”者16人、“助教”7人。乍浦集咏原事,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参编成员。其中卷一采录明代作者共12人,卷二至卷十四采录清代诗人488人,总体上清代诗人占绝大多数,卷十五采录闺秀诗作29人,卷十六采录方外以及域外诗人的诗作,其中释氏14人、羽士14人、外域4人。外域4人中,日本人3位,另有一位国籍不明。也就是说,《乍浦集咏》不但有一支规模宏大、分工明确的编纂队伍,而且还有500多位诗词作者。《乍浦集咏》拥有如此多的参编成员和如此多的作者队伍,在诗歌编纂中是屈指可数的。从辑录的明清期间至清道光年间五百多位作者的近千首诗歌来看,如此庞大的编纂工作量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不足为奇,但在当时交通相对闭塞、通信相当落后的清代,要完成《乍浦集咏》诗集如此大的工作量,其难度可想而知。从中可以看出,清代乍浦文人沈筠在《乍浦集咏》的组织编纂中,不知下了多少苦功夫。

《乍浦集咏》始编于道光壬寅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迄于道光丙午(1846),是年即刊行于世。我们在《乍浦集咏》复印件的卷末看到“乍川潘文秀斋刊”,这个落款也表明,乍川即乍浦,该书应该是刻于乍浦当地的潘文秀书斋。由此也可见,当时乍浦文化的繁荣昌盛。

《乍浦集咏》不仅是乍浦的诗歌文献,还为学界提供了一部“以诗存地”的罕见总集。500多名诗人的近千首诗,都是“地方性”或者说带有鲜明的“乍浦烙印”,这些“乍浦烙印”为其他地方少有或没有,而以乍浦本地多有或特有。当然,这些有着乍浦“地方性”和“乍浦烙印”的诗词,并不像地方志那样有条有理地细细分析并依次排列,使人一目了然。因为《乍浦集咏》所辑之诗皆出自多人之手,并没有明确的写作要求与写作分工,所以这些带有“地方性”和“乍浦烙印”的诗词虽然如同珍珠一样闪光,但却是散落于各处,需要从中仔细阅读、细心体会,才能够认识到这些歌咏乍浦的景、事、人、海等最具“地方性”的表现。

描述乍浦自然景观是《乍浦集咏》的一个重要方面,乍浦紧靠杭州湾北岸,又有天目山余脉的九龙山。山、海、水、滩、港、岛等独具江南特色的自然景观成为乍浦最为重要的景色。所以《乍浦集咏》中采录了不少有关吟咏山的诗作,例如(卷十三)叶兰生的《乍浦雅山十咏》,分别吟咏了雅山十景。(卷三)顾其铭的《陈山八咏和陈琴思》、(卷九)钱椒海的《陈山八咏》皆是对“陈山八景”的吟咏。(卷二)潘梦庭的《陈山顶观日月合璧》、(卷六)翁广平的《观日月合璧作歌》吟咏的则是乍浦最为特色的“日月合璧”之景。

乍浦海景也是《乍浦集咏》中吟咏的一个方面,《乍浦集咏》中提及了若干吟咏海景的诗篇,其中“观海”篇32首,“望海”篇21首,其他涉及听潮、观滩、观港、观现(即海市蜃楼)的诗篇有若干。这些吟咏乍浦海景的诗读起来令人之一振,如海景可以是“孤帆天际浮,万马潮头壮”,也可以是“顷刻空中现城阙,楼台亭馆杂宫室”(卷三《海现》)“俄顷楼台成杰构,嵯峨城阙起层楼”(卷八《观海市》)。诗中描述得亦真亦幻的海市蜃楼虚景让人如身临其境。这些诗篇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乍浦之海的壮丽、魔幻,是乍浦极具独特魅力的景观。

乍浦是一个重要港口,也是军事要塞,历代政府都对乍浦加强军事驻防,至今乍浦还有天妃宫古炮台、南湾炮台、葫芦城等军事遗迹,因此乍浦也多了另一道风景,即观赏军事要塞或军事训练,这使得乍浦较别处更多了些军事紧迫感与海疆边塞风味。《乍浦集咏》辑录了不少这样的诗篇,例如钱起隆《乍浦观操》(卷三)载:“鼓棹湖东数里程,霜高虎帐拥孤城。欲当海宴犹防患,始

信时清不废兵。山影日斜横剑影,弓声风劲压潮声。书生素有雄心在,肯让终军独请缨。”可见这样的场景带给诗人的视觉冲击与内心震撼,因为乍浦此景尤其具有“地方性”特色。

人文古迹也是乍浦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乍浦的人文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乍浦有齐景公庙,传说齐景公曾南游此地,所以乍浦历史上还设有齐景乡,至秦又相传秦始皇东游经此,在山上观海而晕,故乍浦有晕顶山,相连的高公山上还有秦皇试剑石遗存,至汉又有三将军庙,祀齐义士田横、田荣、田广。人文古迹还有屋园、卷勺园、梁庄、海忠介祠、四明禅院等景观。当时这些历史遗迹无疑为乍浦增添了厚重的人文底蕴,也成为后世文人反复吟咏的对象。在《乍浦集咏》中,可以看到辑录了大量吟咏人文古迹这样的诗作。写齐景公庙的诗就有5首,写三将军庙的诗有3首,而歌咏与李天植相关的屋园有24首,卷勺园的诗则有14首。其他有关祠、冢、庵、庙、寺、楼等古迹的吟咏的诗也都有不少篇幅。如今,乍浦许多人文古迹景观已经消失,但我们可以通过《乍浦集咏》,感受到当年人文古迹那一幅幅的壮美景观。

记录乍浦发生的事,也是《乍浦集咏》纯粹“地方性”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事,仅为乍浦所独有。对于一个地区而言,灾难是最令人痛心、最难以忘怀的事,《乍浦集咏》中不乏这方面的诗歌。乍浦临海,水患不断,本地诗人王嘉玉《大水纪事》(卷六)记载道光癸未(1823)七月的水灾尤其令人动容。诗云:“入秋叹愁霖,河流势洄洑,划当海潮连,暴涨一瞬息,湿云臃平天,狂飙拔木,桥塞难通舟,檐倾似泻瀑。天心默降灾,涵涌靡约束。特恐吾其鱼,顿觉岸为谷。薄暮雨脚停,水鸟飞上屋。一片俱汪洋,莫望田禾熟。”王嘉玉在诗中如此生动逼真的描述,非亲历、亲见其惨状,是写不出的。旱灾同样是令人伤痛的事,平湖诗人孙连豫《甲戌夏五悯旱诗次顾蔗香曼臣韵》(卷四),叙述了嘉庆甲戌(1814)夏天旱灾给乍浦当地水稻造成的灾难:“草木焦卷日杲杲,低田龟裂断行潦”。然而人们却只能“且挟呼天度襦袴”,希望上天“俯鉴垂怜岂不好”。面对自然灾害,乡民常常自救,积极应对,或疏浚河道,或修筑防洪大堤。蒋元的《周家堰》(卷三)诗写乡民捐款修建海防堰堤的事,诗云:“内而达濠河,外而通大海。一堰砥中流,周防慎毋怠。”并于诗末引外志语:“宋臣赵善悉筑海盐堰八十有一,内分属平湖者三十有九,正为旱干水溢,恐其以邻国为壑也,而周家堰尤为要之地。”

一个地方带给世人的名气,不仅关乎其风景、轶事,更在于其人。人地以而存其身,地以人而扬其名。《乍浦集咏》特别注意辑录与当地先贤、英雄、烈士等相关的诗篇。乍浦历代有很多乡贤,李天植无疑是最著名的一位。李天植为明遗民,在乍浦乃至全国都受人尊敬,因此,李天植自然也成为《乍浦集咏》重点收录的先贤。在《乍浦集咏》里,与其相关的诗总计有51首。这些诗或是吟咏其守志行止,或是吟咏其屋园、祠宇等遗迹,或是祭拜其遗像、著作等。

乍浦临海,时常有倭乱,这也使得乍浦产生了不少的英雄人物,周翼明是一位抗倭英雄,战死疆场,乡人建祠纪念,《九山志》载其墓在乍浦黄山。《乍浦集咏》中也有不少歌咏其英勇壮举的诗,例如吴振东的《周将军翼明

故居》(卷三)。同时殉难的还有康承爵亦为乍浦人仅存衣冠冢。徐惟清《拜康德征都督墓》(卷九)有赞:“石椁至今标梗概,金棺空自葬衣裳,丹心殉国孤忠苦,青史留名万古香。”

在《乍浦集咏》中,沈筠对有关节妇、烈女的诗篇特别用心收集。这可能与沈筠的亲身经历有关,沈筠出生才6个月,其父即去世,年仅24岁,沈筠母亲一生守节:“寡后饮冰食糗,以苦节闻,亦能诗,著有《先得月楼稿》”(卷八《殷家浜》诗末注)。诗集中采录了歌咏其母的诗共17篇,这些诗篇或是赞扬沈母守节、辛劳,或是赞扬沈母卓越的诗歌才华。如果说沈母是可歌可颂的话,诗集中所涉及刘烈女、林烈女、胡烈女则可泣可叹。例如刘烈女,名凤姑,刘进之女,道光二十二年(1842)乍浦倭乱,投井而亡,诗集中有7首诗对其颂扬,其中含一首日本诗人刘吉甫的《乍浦刘烈女》(卷十六),称其“事传殊域三千里”。并认为可编入史书,“他年国史知编入,岂但贞珉为勒铭”,给予高度赞许。

乍浦之海也是保证该诗集纯粹“地方性”的一个方面,翻开《乍浦集咏》,一股大海的味道扑面而来,诗集中辑录了若干与大海相关的诗篇,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诗歌总集的最大不同之处。海产是乍浦的特色,乍浦黄鱼为海产中之特产。当地人知道榭树花开的时节是捕捞黄鱼的最佳时期,“三吴五月炎蒸初,榭树着雨花扶疏,此时黄鱼最称美,风味绝胜长桥鲈。”(卷二《有客言黄鱼事纪之》)。过去江浙一带的黄鱼基本上都来自乍浦,沈筠于该诗尾注云:“苏郡黄鱼皆贩自乍浦,并且当地人还知道如何做鱼保鲜,张燕昌《棹歌》(卷五)尾注载:“首鱼俗名黄鱼,禾中贩黄鱼者从宁波航海至乍浦,夜灯书‘冰鲜’字,盖以冰实鱼腹,味乃不变。”其他海产如沙虎、白鲟、海狮等也时有诗篇吟咏,作为临海而居、靠海吃海的港口小镇,这里不仅有腥味“风吹鱼腥腥”(卷十一《乍浦》)、“鱼市海风腥”(卷七《乍浦郭外信步》)。而且还写出了当时喧嚣的场景,“潮平腥气入,鱼上市声喧”(卷四《唐湾鱼市》)、“人喧渔市早”(卷三《自清溪至乍浦即事联句》)。乍浦的鱼市相当热闹,“一路众鲜齐入市,海滨新到贩鱼船”(卷五《棹歌》)。当然贩鱼人也很辛苦,多是凌晨即开始劳作了。“入浦鱼商宵作市”(卷六《乍浦》)。这里还有来自东南沿海各地的鱼商“入市鱼盐人竞利,聆音闽粤语难调”(卷七《乍浦杂咏》)。我们可以由此感知乍浦渔港的节奏,这些诗作的入选使得《乍浦集咏》独具大海味道的风格。

乍浦的海也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港口,《乍浦集咏》中辑录了不少乍浦对外通商的诗篇,如“箫鼓天妃庙,樯帆日本舟”(卷二《登乍浦陈山》)。这是远来的日本商船“频贡贡赋通诸国,不断梯航接九州”(卷五《乍浦》),表明通商的国家不止日本一国,乍浦的对外贸易在当时而言十分繁荣。沈衡鉴《海上竹枝词》(卷五)对此有具体描述:“城中几日送梅雨,海上连朝舶趁风,报说洋船齐进口,便开官局看称铜。”

《乍浦集咏》只辑录与乍浦相关的诗歌,而这种“以诗存地”的集子,在过去府县级都极为少见,市镇级就更少,乍浦作为一个江南小镇,有这样一部“以诗存地”的诗歌总集,这表明了《乍浦集咏》的罕见与典范价值。又因为《乍浦集咏》总集辑录了大量关乎海洋生活特别是

灾难、战争等方面的诗作,与多数地方诗总集所载有很大不同,更使得《乍浦集咏》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别具一格。

《乍浦集咏》不但是乍浦诗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由于保存了许多文献资料,也就具有了地域文化价值,所以说《乍浦集咏》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有韵味的地方志,也是外地之人了解乍浦文化的窗口。

乍浦地处文化鼎盛的江南、浙西交界,因而人文氛围浓厚。道光年间海盐状元朱昌颐在《乍浦集咏》序中云:“乍浦地虽一隅,久与明洲沪渎岬鼎峙,为浙西一重镇,自前明以来,人文蔚起,诗教日兴,即四方之来游者流览山川之胜,辄多歌咏,惜乍浦诸志艺文所载,俱属寥寥,有能继起而广搜博采汇为一编,岂不极一镇之大观乎?”朱昌颐认为乍浦应当有一部能收集当地诗歌的总集,其实在《乍浦集咏》之前已经有人从事这样的工作了,徐熊飞著有《锦囊集》二卷,李天植撰、宋景关辑《龙湫集》卷末附《乍川题咏》一卷,皆为辑录当地的诗歌集子,但是规模无法与《乍浦集咏》相比。盛焄辑《龙漱嗣音集乍》十二卷,规模较大,但所辑录的诗人皆囿于本地。《乍浦集咏》的地域文化价值,沈筠的同代人就已经察觉到了,龙光甸在为《乍浦集咏》作序中认为:“远溯明季,近迨于今,不拘何郡何省之人,凡有关于乍浦者,自达官、士林、隐逸、方外、闺秀所著,无不搜罗,不特《乍浦志》中所未备,且事迹、人物可补志乘之所缺,他日续志者无俟旁稽博访,取诸兹集而有余。”实际上沈筠辑《乍浦集咏》始终贯穿着保存地方文献的思想。《例言》载:“是编为志乘借材,故自前朝迄今诸集中题咏有关我里者,取之以备采择。”沈筠此举重在突出《乍浦集咏》的新颖与独创,从而增加其价值品位。《乍浦集咏》的地域文化价值都蕴含于所采诗歌之中,透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认识乍浦这个小镇的文化。

乍浦是一个海港小镇,有海景、通外商,充满了奇异、神秘色彩,同时乍浦又不仅仅是一个小镇,因其经常遭受倭乱,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更多了些苍凉悲壮之感,平添了边疆军旅之情。因此《乍浦集咏》又是一部“以小见大”的诗集,给世人提供了认识全国海防的历史与窗口,在卷一沈筠即对乍浦倭乱进行了宏观描述:“前明海上寇氛日炽,人鬼为邻,游履罕至,国朝设镇,尚武崇文,讲舍造士,戈船习军,安流鱼肥,繁柯花艳,歌咏太平,一时坵坵妖魅为患,壬寅夏初,文昂战场,词感园芜,事足征实,幽愤以闻,心赏手抄,积久成卷,决择既审,藏诸名山,志乘借材,以备采册。”沈筠用这段文字概述了乍浦的海防史,也表明了海防将是《乍浦集咏》中的重点内容。

“二百年来久安堵,恬熙日习忘轻侮。岛夷船炮一朝至,岌岌危疆孰为主。传闻陔兵稍斗伤,此外列营全失伍。”由这首诗可知:乍浦在元代至正年间开始有海上贸易,从明初开始筑乍浦城,至明中叶倭患尤为严重,清初至雍正时期不断巩固海防,但是由于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海防稳固,军队疏于训练,于是在道光壬寅(1842)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烧到乍浦时,清兵溃不成军,这首诗写的是乍浦,反映的却不仅仅是乍浦的悲哀,更是整个中国近代海防的伤痛。这种担忧最终在道光壬寅年达到一个顶峰,沈筠是这次事件的亲历者,他对于鸦片战争中乍浦所遭受的战乱尤感伤痛。《乍浦集咏》中收录了若干与他同时期诗人的作品,实际上壬寅之乱也是促成他编纂该总集的一个动力。此次战争既有让人心痛的一面,也让人看到了军民抗击外敌入侵的勇气与壮举。沈筠后来又编纂《壬寅乍浦殉难录》,以纪念殉国者,这也可以解释沈筠在《乍浦集咏》中为何辑录了大量关于壬寅之难的诗篇。

《乍浦集咏》纂成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同年即东传至日本,在日本产生了广泛影响,因为日本当时也是深受英国之害,《乍浦集咏》所记所载引起了日本人士的共鸣。于是在《乍浦集咏》的基础上,伊藤主介、小野湖山分别将其中有关抗英斗争的诗篇辑成《乍川纪事录》《乍浦集咏抄》两部选本,以警示世人。从这一点上看,《乍浦集咏》虽然所截止于乍浦,但实际上却又突破了乍浦,它既为学界提供了一部“以诗存地”的地方诗总集的范本,保存了当地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料,展示了乍浦海边风光、对外通商的历史,又把海疆战争的悲壮色彩涂于卷册之中,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伤痛与反思。从中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乍浦集咏》诗总集反映出的那一份浓厚的家国情怀。

维系文脉功至伟

《当湖文系初编》的编纂

■ 郭杰光

明清之际,对地方诗文总集的编纂蔚然一时。一个地方,因年代久远、时代动乱、朝代交替等诸种因素,诗文书画经过水火兵燹之后或散佚四处或损失惨重,而且错讹难免,考证繁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些明清文人不厌其烦地爬罗剔抉甚至甘愿为之呕心沥血呢?想来,一是桑梓情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是《诗经》中的一句。凡文化上的古道热肠者总希望“文章不死,俾后之有志称先者,得藉以溯其流风余韵”。恭敬桑梓,缅怀先辈,编纂者把浓厚的桑梓情怀及对故乡文化的喜爱,转换为保存乡贤文献的动力,奋力辑录即将散佚、湮没的前辈诗文,诗文书,存者存,文化亦存。二是延续文脉。清初王崇简辑《畿辅明诗》,其在序中如此表明心志:“既而遭遇寇变,万卷遗书并皆散佚矣。因念吾乡前辈或有遗诗而不传,或传而未广……兵燹焚劫之余,雨散灰飞者谅亦不少。表章之责,岂不在乡之后进乎?”三是裨益他集。前代总集在收录上顾此失彼或使明珠暗投,自是在所难免,后来的编纂者就会为之纠偏,同时也着眼于彰显当地诗文影响力。四是筹备方志。为补地方志中艺文志著录诗文的不足,或筹备志参考,这样的编纂就会显得必要与迫切。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脉,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五是发潜阐幽。编纂总集,阐扬前人,有所寄托。清全祖望辑《续甬上耆旧诗》,序中记载:“选录古今体诗一万五千九百余首,其小传多载遗闻轶事,为野乘所未见。”黄维焯跋云:“是书阐发忠烈,表彰贞逸,于乡邦一代文献,关系尤巨。”可见以诗

文存史,寄托遥深。清代《当湖文系初编》的集成与刊布,全是仰仗了朱王林、顾广誉、贾敦良、叶廉锬、俞铨、陆潢等平湖乡邦贤达的共同努力。朱王林(1798—1858)字礼卿,号小云。世居林埭镇徐家埭。清嘉庆十六年(1811)以会试头名中进士,官至直隶按察使。从政三十余年,谨操守,勤职守,颇为同僚所推重。喜聚书,然不滥于搜罗,所收皆谨慎有法,积书五楹,自诩为“小万卷楼”,编有《小万卷楼书目》三册。诗文集著作有《小云吟稿》《小云庐诗稿删存》《小云庐晚学文稿》等。评论家说其诗“吐言天拔,蝉蜕尘俗,鸿博绝丽,牢笼百家”。顾广誉(1798—1865)字维康,号访溪。优贡生。清咸丰元年(1851)荐举孝廉方正,未与廷试。经术湛深,尤精《诗》《礼》。同治年间,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以正学教生徒,远近闻风而起。著有《学诗详说》《学诗正诂》《四礼推疑》《悔过斋文稿》。贾敦良(1808—1865),字博如,号芝芳。清道光时诸生。善论古文,一以桐城为宗。论诗三十年,力追古人。撰有《耆旧录》《贾芝芳自纂年谱》《书法通辨》《花南小志》《餐霞仙馆诗稿》《餐霞仙馆文稿》等。叶廉锬(1813—1885)字清士,号勤取。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曾主讲当湖书院、海盐蔚文书院、乍浦九峰书院。光绪初,知县姚光宇、彭润章先后聘修县志。工诗赋,著有《经古篋存草》等。俞铨,字芷衫。诗力追慕老杜,时称城南诗伯。著有《蹄涔集文钞》《芷衫诗钞》等。陆潢,字孔愉,号松坪。清道光时郡廪生。著有《忠义节烈汇编》《清燕堂诗存》。

凡事总有缘起。上述几位先贤达人中,对《当湖文系初编》有承先启后之功的当属朱王林。朱王林辞官归家后,仍关心国事,日读群书,凡关系时事者,必手自抄录。咸丰七年(1857)五月,顾广誉拜访朱王林。时年已77岁的朱王林忽然叹道:“邑自置治以来,几四百年矣,未有编辑古文词传之世以备文献者。积思取法沈明经客子(季友)《槐李诗系》书,以之何?”其实,与朱王林有同样思虑的不乏人在,如贾敦良,他曾说:“吾邑自六朝迄于宋元,代有文人,及有明宣德间置治以来,名儒辈出,文教日隆。惟是世远年远,典籍易阙,不独布衣诸生文未刊播,淹没不彰何可胜数。即当其时声名显著,刻集流传,而至于今枣木无存,遗书散失者又不少也。呜呼!文献不足征今已若斯,更数十年后,当复何如?”心有戚戚也的顾广誉乃与邑人叶廉锬、贾敦良、俞铨、陆潢等商议,决定由他们五人负责搜罗甄录,而朱王林总其成。“于是撰征启,求遗文,而故家藏弃之书多出”。然好事多磨,一番网罗蠹简,搜录从残,编纂始定,开雕版印刷仅十分之三四,朱王林便在翌年春病逝,临殁时犹挂念此书。其侄朱兆英继承伯父之业,终于在咸丰九年(1859)完成《当湖文系初编》雕版,印出了样本。不料平湖被太平军占领,朱王林之子朱寿熊将书版寄藏于徐埭故宅,竟毁于战火。战争结束后,朱氏后人四处搜访样本,终无所获。后来避难于宁波的叶廉锬携回半部样本,而马承昭于金山的金瘦仙家亦得到半部(此半部为贾敦良避难时寄存,敦良卒后,便留金家),合之终成全璧。朱王林原版本为二十四卷,朱寿熊重为编次,定为二十

八卷,葛金焯又撰作者小传列于卷首。从光绪十二年(1886)开始正式刊行,历时三载,于光绪十五年完成。朱王林之书朱仁权在撰写书跋时感慨万千:“呜呼!书之存亡显晦,关乎天,实系于人,非马(承昭)、叶(廉锬)两先生之物色于风尘,则无以为延津之合;非彭(润章)明府之力任是役,则终湮没而不传。今既幸是书工竣,藉以告慰于邑诸先正者,即可告慰于先祖。”《当湖文系初编》录文五百余篇,共二十八卷,其文体包罗万象,赋、赋、论、论议、说辨、考释、序、引、跋、书后、题辞、记、疏、表、册、条陈、详文、书、跋、后、书、事、墓表、墓志铭、行状、诔辞、祭文、杂文等各种体裁兼具。收录作者百余人,始自南朝顾野王,迄于清咸丰初年的作者。其中既有名满天下的赵孟坚、陆陇其、沈初诸人,也有当湖布衣如沈岸登、卢锡爵、陆礼征诸人。综观录入该书的文章辞赋,其文风有华丽优美者,有清丽脱俗者,也有朴素自然者;其内容有的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议论,有忧国忧民、心系时事的抒怀,也有尊崇理学、昌明学术的论述。至于有关平湖一县的人情故事、风土纪略,在《当湖文系初编》中更是历历可见,不胜枚举。参与《当湖文系初编》整个过程的贾敦良对这部“荟萃群言,以传久远”的书很有自信,也充满了期待,他在《跋》中写道:“虽仿《槐李诗系》,而实以文之所系,关于一邑之风俗人心者甚重,后之人读是编者,其亦体先生(指朱王林)之用心,将由文艺而进乎德行,以求无愧于圣贤之道也。”《当湖文系初编》一书,“资政、教化、存史”皆具,既是平湖历代文化发展之见证,同时对维系平湖文脉诚然是厥功至伟。